

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

三晋石刻大全



● 晋中市和顺县卷

主 编 冯锦昌



总 主 编 刘泽民
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三晋出版社



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

三晋石刻大全



●晋中市和顺县卷

主编 冯锦昌



三晋石刻大会

总主编 刘泽民
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三晋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晋石刻大全. 晋中市和顺县卷 / 刘泽民主编; 冯锦昌分册主编. —太原: 三晋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457-0678-9

I. 三… II. ①刘… ②冯… III. ①石刻—和顺县—图录 IV. ①K877.40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20487 号

三晋石刻大全 · 晋中市和顺县卷

总 主 编: 刘泽民

执行总主编: 李玉明

本 卷 主 编: 冯锦昌

本 卷 审 定: 陈霞村

责 任 编 辑: 任俊芳

责 任 印 制: 李佳音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三晋出版社(原山西古籍出版社)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4922268(发行中心)

0351-4956036(综合办)

0351-4922203(印制部)

E — mail: sj@sxpmg.com

网 址: <http://sjs.sxpmg.com>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8

印 张: 51

字 数: 36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12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7-0678-9

定 价: 30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ISBN 978-7-5457-0678-9



9 787545 706789 >

封扉题签：姚奠中



《三晋石刻大全》编纂委员会

顾 问：薛延忠 金道铭 申维辰 申联彬 李小鹏
高建民 胡苏平 张 平 李立功 胡富国
白清才 郭裕怀 杨安和 李学勤 姚奠中
张正明 令政策 李潭生 刘 江 张 颌

主 任：刘泽民
常 务 主 任：李玉明

副 主 任：罗广德 李茂盛 刘在文 田中仁 雷忠勤
柴泽俊 刘纬毅 降大任 郭士星 赵望进
杨子荣 邢利斌 梁俊明 张玉洁 崔正森
贾玉瑞 翁小绵 陈 明 齐荣晋 于贵卿
宋新梅

委 员（按姓氏笔画排列）：
王敏政 石金鸣 史耀清 刘光彦 张鸿仁
吴广隆 李 尧 李 菲 李小强 刘合心
高 可 崔正森 董占锁 董瑞山 潘孝忠
霍润德

总 主 编：刘泽民
执行总主编：李玉明

副 主 编：罗广德 李茂盛 杨子荣 文 琴 张继红
落馥香

审 定：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

《三晋石刻大全》晋中市编纂委员会

顾 问：张 璞 吴清海

主 任：程锡景 黄耀春 王建林

成 员：温毓诚 郭润生 朱荣耀 武志远 耿彦军
安振禄 杨 玉 王俊山 张定邦 王敏政
武增亮 葛凤英 张晋平 晋 华 李文瑞

指导编审组：王敏政 晋 华 张晋平 李文瑞

《三晋石刻大全·晋中市和顺县卷》编委会

顾 问：孙永胜 马海军

主 任：赵成武 杨治国 刘素英 刘秀中 韩 亮

副 主 任：常跃生 邓永林 陈建军 于 涛 任建亮
王 璞 郑月林

主 编：冯锦昌

文 字 编 辑：马 逸 柳献荣

拓 印 编 辑：冯锦昌 陈晋兵 李 杰

工 作 人 员：柳 敏 祁 峰 侯建华 魏瑞卿 左青香

凡 例

一、以抢救和存史为收录原则。收录范围：以《三晋石刻总目》为基础，凡古代、近现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现存和佚失石刻全部全文收录（其中新中国成立后没有社会文化价值的私人墓碑等除外）。收录上下限：上限从本地最早的石刻起，下限到定稿为止。

二、以县（市、区）分卷，原则上每县（市、区）一卷，另有山西省博物院卷、五台山卷、晋商会馆卷和总目各一卷。

三、“概述”为一个县（市、区）或石刻收藏单位总论性的文章，既有资料性，又有学术性，内容主要包括：石刻历史发展（收藏）演变情况、现在分布区域、类别、时代、数量和保存情况，重要石刻简述、主要特色和价值评估、保护和利用建议等。

四、石刻单位称谓：各类碑刻（包括造像碑）一律称“通”；石碣（或刻石），称“块”或“方”；经幢（包括石幢）称“尊”；墓志和墓志铭，有盖的称“盒”，无盖的称“方”；画像（图像）石、匾额、塔铭、法帖，称“方”或“块”；摩崖题记称“处”或“条”。石柱，称“根”；戒牒，刻在碑上的称“通”，刻在碣上的，称“方”或“块”。石刻录文称谓：碑，称“碑文”；碣（刻石），称“碣文”或“刻文”（镌刻诗赋的，称“诗文”）；造像碑（含座），称“发愿文”；墓志铭和墓志，称“志文”；石匾，称“匾文”（镌刻帝王诏令的，称“敕文”）；摩崖题刻、画像石、石幢（内容非经文者）、石柱等，称“题记”或“题刻”；经幢，称“经文”；塔铭，称“铭文”；墓表，称“表文”；石对联，称“联文”；戒（度）牒，称“牒文”；法帖，称“帖文”。

五、不设篇、章、节，一件石刻独立成篇。全卷录文分两部分，即现存石刻、佚失石刻。以县（市、区）为纲，分别按时代顺序排列，不分类。

六、每件石刻编纂内容包括“名称”（全称）、“简介”、录文（全文）。另附照片或拓片。

七、凡涉及人物的石刻，“简介”除介绍石刻外，还应介绍人物的生卒年、籍贯、主要官职、生平事迹、著述等；凡涉及人物籍贯的，一律用原地名，括号内注明今地名。如郭泰，太原界休（今山西省介休市）人。

八、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有不少石刻陆续由原址搬迁到异地，这部分石刻均以现收藏单位收录。地址一律按原址书写，然后注明搬迁时间和地点。

九、真假或断代暂无定论的石刻，可沿用旧说或存疑。有几种说法的，诸说并存。

十、纪年：1912年以前的石刻一律用历史纪年，括注公元纪年，如唐贞观元年（627）。括号内公元年号前后不加“公元”和“年”字。1912年以后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一律用民国纪年，括注公元纪年，如中华民国16年（1927），也可写成“民国16年（1927）”。民国年号用阿拉伯数字，不用汉字。1949年10月1日之后，一律用公元纪年。

十一、表示体积、面积等尺寸的，用“厘米”。如长（或高）120、宽60、厚80厘米，长、宽

均不加“厘米”二字，用顿号间隔。

十二、收录的石刻文字原为繁体字的，仍用繁体字；原为简化字的，仍用简化字。1957年汉字简化之后，有的碑繁简混用，录文尽量保持原貌，以保存史料的真实性。

录文横排，原则上根据文意分段，不易分段的，可以连排。编者所加文字，用楷体字，并加圆括号，以与正文宋体字区别。如“(碑阳)”、“(碑阴)”等。

十三、收录的石刻文字，只作标点，不作校勘，原文中的错别字、异体字、通假字及不当之处等，保持原貌，不作甄别、注释和加括注。

十四、石刻文字漫漶、剥泐不清的，用一字一“□”表示。漫漶、剥泐字数不清的，用“……”或“下阙”表示。

十五、索引按类编排，使本书既可按历史顺序阅读，又可按类检索，互为补充，相得益彰。

总序

李玉明

石刻,指镌刻有文字的历代碑、碣、造像碑、经幢、石幢(内容非经文者)、摩崖题记、墓志铭、画像石等,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。

石刻,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。狭义的理解,专指“碑”;广义的理解,包括碑、墓志、造像等各类刻石。

所谓“碑”,汉以前就有了,但那时的碑不是为了刻字,而是立于宗庙、学校,用以观日影、记时刻、测方向的。古代礼仪规定,主人迎宾进宗庙之门要当碑而揖。祭祀时亦常常把祭祀用的牛羊等牺牲先拴于碑上。碑在古代还有另一种用途,是立于墓前用于棺木下葬,称为“窆石”。下棺时用以固定轭轳,所以早期的墓碑中上部有穿,称之为“碑穿”,用以系绳下棺;在宗庙之碑则为系牺牲的牛羊所用。因此,最初碑的用途并非为了刻字,而是实用。

现代意义上的“碑”,兴起于西汉而盛于东汉。原来在西汉以前,即商周时期歌功颂德的文字铸刻在钟鼎彝器上,西汉开始以石代金,用碑记载功德和事件了。这即是金石铭文的由来。

从西汉“碑”开始镌刻文字以来,历朝历代的碑刻大体相似,均由碑首、碑身、碑座三部分组成。但各类碑之间又呈现繁多的样式。碑头有圭首、圆首、平首、梯首、冠形首、螭首等。碑身以长方形为多,另有倒瓶形,六棱、八棱形,正方柱形,扁方形等。碑座有龟趺形,形状庄重,采用得最多。古人以龟为长久,常常以龟(实际称鼋)背碑。碑的内容有功德碑,记载文臣武将的文治武功;庙碑,种类繁多,记述庙的修建历史;墓碑,记载死者籍贯、世系、事迹及卒葬时间等。还有记事碑、纪念碑、文告碑、诗文碑等。

从现代广义上讲,凡是镌刻有文字的石刻都可以称为碑刻,而在先秦时除“碑”以外,其他都不称碑,而称“刻石”。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刻石是商代的《小臣系卣》和一些石磬刻字。以后有秦石鼓文,秦始皇峰山、泰山、琅琊台刻石等。汉以后这些刻石逐渐统称碑石了。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国道教兴起后,又出现了宗教刻石及造像。山西是我国中原地区宗教刻石最早产生和发展的省份之一,云冈石窟、天龙山石窟,以及现在散存在全省各地大量的经幢、石幢、造像碑等刻石,见证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轨迹。另外,作为墓碑衍化物的墓志,起源于汉代,形制为长方形。而标准方形的墓志则兴起于魏晋南北朝,大盛于唐,是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比如山西现存的北魏司马金龙墓志,封和宪、辛祥墓志;北齐裴良、庾狄回洛、娄叡墓志;东魏刘懿墓志等。

石刻最大的特点,是能长久地保存下去,故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历史,简称“石史”。它最大的功用,是可以证史、补史和纠正官修书面历史记载的舛误,在弘扬民族文化,借鉴历史经验,在为社会主义政治、物质、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方面,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,历来受到地方当局、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爱好者重视。例如,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殿堂式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,1937年梁思成先生调查发现后,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。殿前镌刻于唐大中十一年(857)的经幢,解决了该殿学术上的两大问题。一是根据经幢的记载,该殿始建于唐德宗大中十一年(857),不仅使该殿是唐代建筑得到了有力的佐证,而且使这座国宝级文物建筑有了准确的纪年,其学术价值大大被提升。二是从这幢经幢的记载中得知,佛光寺东大殿的施主(即捐资人)是长安官宦人家出身的女弟子“宁公遇”。由于施主的身份高,其建筑的级别也相应被提高。又例如,山西现存一万八千多处古建筑,其每处建筑的历史沿革,要么文献记载简单,多数只一句话;要么查不到任何记载。而这些建筑前前后后的历史发展变化情况,主要靠现存碑刻的记载来解决,因而各座古建筑附属的碑刻就成了该古建筑历史沿革有力的证据。再例如,山西历史上的灾荒不断,元大德七年(1303)平阳、太原地区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;清光绪三年(1877)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旱灾,连续三年颗粒无收,死亡百姓不计其数,并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。这些灾荒,由于历史的原因(如

信息不畅),或是地方官员为保乌纱帽,有意隐瞒,因而文献记载零碎简单,甚至缺失无记载。而民间百姓在灾荒过后却镌刻了不少碑刻,使后人永志不忘。这些灾荒碑虽有不少毁于战火,或被人为破坏,但各地保存至今的仍有不少,已成为研究山西历史地震、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宝贵资料。除灾荒碑外,存世的还有不少古代科技方面的碑石,是研究当地农林水利、医药等发展的重要实证。三晋石刻是我省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人文资源。因此,编辑出版《三晋石刻大全》,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,而且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,是功在千秋、荫及子孙的一件好事、善事。

自宋代兴起金石学以来,访求石刻是历代众多史学家、方志学家们的终生爱好和追求。山西自明成化十年(1474)创始《山西通志》时,就收录了“金石”资料,现在能够作为代表的是清光绪年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编的《山右石刻丛编》。这套《丛编》于光绪二十五年(1899)出版,共40卷,收录北魏至元代计14个王朝840余年的各类石刻720通(件)。还有在此之前于光绪十八年(1892)官修的《山西通志·金石记》(单行本称《山右金石记》),杨笃(秋湄)主编,收录汉以来碑刻1550余通。《山西通志·金石记》与《山右石刻丛编》比较,前者“有则录之,存亡不计”,后者“存者收录,亡者不述”。

山西历史上石刻最多时究竟有多少,谁也说说不准。新中国成立后,经过文物部门的多次调查和普查,山西现存各类碑碣大约两万。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《语石》中说:“大抵晋碑皆萃于蒲、绛、泽、潞四属。”四属原都称州,大体上是现在的运城、临汾、晋城、长治四市,即山西南部地区。《山右石刻丛编》收录的720通碑刻,属于上述四州的有496通,占全省的68.9%;《山西通志·金石记》收录的1550余通碑刻,属于上述四州的有993通,占全省的64%;现存的两万余通石刻中,上述四市占了全省的一半以上,叶氏的论断基本是正确的。但除上述四州(四市)外,其他地区也有不少碑刻存世,其中不乏精品,同样应予以重视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,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门和有关部门、团体,以及个人爱好者在石刻的调查、保护、拓印、研究、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,取得了一定成果。但这些成果比较零星分散,缺乏全面性、系统性;也没有一个专门访求石刻的机构,使这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制约。其次,历史资料少而缺失,已出版问世的石刻著作,存量极少,不仅难求,而且收录不全。比如,《山右石刻丛编》和《山西通志·金石记》均只收录到元代,且遗漏不少,大量明清时期的碑刻未被采摭,造成历史的遗憾;宋代赵明诚的《金石录》只收录山西唐以前碑石45通;清代王昶的《金石萃编》,只收录山西元以前碑石近30通。所有这些,都需要我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,做大量的拾遗补缺工作。第三,建国以来又新发现了大量的石刻,特别是新发现和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墓志铭、摩崖题记、造像碑等,大大丰富了山西石刻的研究资料。比如北朝至隋唐一批重要墓志的出土、黄河沿岸等处汉以来漕运摩崖题记和一批早期造像碑的发现,以及其他一大批新发现石刻的著录登记等,都是重要的石刻资料,这些都需要有人去进一步访求和研究。第四,石刻文物具有不能再生性的特点,毁一件即少一件。比如北周武帝二次灭佛,山西的汉碑及三国两晋碑除郭泰碑外,全部被毁。郭泰碑后来也流失不存,造成了“山右无汉碑”的历史遗憾。当前仍存在盗窃和建设工程中人为破坏石刻文物的严重现象,自然损毁也日益加剧,古老石刻随时都有流失和被毁的危险。因此,抢救保护石刻,将其全部著录在册,世代流传下去,是当务之急,是带有抢救和存史双重重要性质的宏大工程。

为了全面系统地开展三晋石刻的访求和研究工作,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,即借鉴历史经验,适应形势的需要,挑起了保护研究石刻传统文化这个重任。从1990年开始,即着手分市编辑出版《三晋石刻总目》,到2006年底,已有9个市《总目》正式出版,共收录存碑11878通,佚碑4168通,合计16046通。

在基本完成《三晋石刻总目》编辑出版的基础上,从2007年正式开始编辑《三晋石刻大全》。《大全》以《总目》为基础,将新中国成立前后不论存佚,有文则存,全文抄录,并断句。同时,每篇加“简介”,附照片或拓片。基本上每县(市、区)1卷,山西博物院和五台山、晋商会馆各1卷,再加记事总目录1卷,全省预计125卷。

分步编辑出版的山西石刻研究成果,其资料价值、历史价值、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将远远超过以往出版的石刻著作,将成为山西有史以来的首创之作,流芳后世,意义深远!

是为序。

序 一

程锡景

“盛世修志，盛事勒石”，极言修志刻石之至要。历代石刻、碑碣多秉笔直书，史料翔实，涉及内容相当广泛，可证史之真伪，可补史之不足。历史上许多疑案、悬案，通过碑碣、墓志等刻石取得佐证，澄清史实，辨别真伪者不乏其例。访求石刻历来为许多史学家、方志学家和文化学者所重视。

晋中市地处三晋腹地，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，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。晋中市境内文物古迹众多，文化遗存丰富，尤其是石刻门类齐全，跨越时间长，具有很高的历史、科学和艺术价值。晋中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已陆续编纂了《晋中碑刻选粹》和《三晋石刻总目·晋中市卷》。前者辑录选拓上自北魏下迄民国的各种碑刻共计 463 石，乃晋中碑刻之精粹；后者收录与前者同一时期的各类石刻目录计 2474 条。晋中市现存碑刻总量约在 3000 通以上，对其不断地进行收录和发掘，有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，有利于打造“晋商文化复兴地”和“文化旅游名市”，有利于加快文化强市建设。

目前已辑录选拓的石刻、碑帖数量虽然不多，但多为珍品，有些属全国罕见，如明洪武年的《新修十八盘并天进郊城堡图碑》、明万历三彩琉璃烧造《空王佛行宫碑记》和《空王殿建修碑》、唐代《汾州抱腹寺碑》、《李光进神道碑铭并序》和《李光颜神道碑铭并序》等。此外，还有许多碑帖的书法艺术价值极高，如清初傅山隶书《郭泰碑》、清中期祁寯藻行书《祁氏支祠碑》、民国时赵铁山楷书《太谷重修大观楼记碑》、常旭春楷书《朱子治家格言刻石》等。然而，由于条件所限，仍有大量有价值的碑刻未被采撷，不能不令人引以为憾。所喜者，近年来由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组织各县（市、区）分别遴选的一批精粹石刻，已陆续编录，汇集成为《三晋石刻大全》，总计收录各类碑刻数千通，使现存石刻中的绝大部分精品与世人见面，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为整理和研究金石碑刻，从收录、遴选、点校到编辑成书，许多同志几经寒暑，甘守寂寞，淡泊名利，不遗余力，终于了此夙愿，其中甘苦，非亲历者所能察也。其精神令人钦佩，不胜感激！古语曰：有志者事竟成。信斯言也！谨此数语，聊以为序！

二〇一一年八月

序 二

和顺县政协主席 杨治国

和顺位于山西东陲，太行绝巘。虽系山区小县，但依山傍水，风光秀美；历史悠久，人文积淀深厚。旧石器晚期，和顺已有人类活动的遗迹，在清漳河沿岸又陆续发现多处新石器时期的村落遗址。有文字记载，和顺在春秋时，为晋大夫梁余子养采邑。战国称阏与，汉为上党郡沾县地，晋属乐平郡，北齐为梁余县，隋开皇十年改称和顺县。境内群山逶迤，沟壑纵横，四周关隘要塞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著名的有战国秦赵阏与之战，汉韩信下赵屯兵处，唐沙陀酋长李克用屯兵处，宋太祖统一北汉经行处，明内长城关隘，无不璀璨生辉，发人思古之幽情。抗战时期，和顺为太行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：八路军总部石拐会议旧址，朱德路居旧址，129师总部警卫团阳曲山保卫战遗址，记录着老一辈革命家和先烈的丰功伟绩，激励着后人高举旗帜，奋勇前进。旧时的和顺关山阻隔，交通闭塞，“水固不能载舟，陆诚难以驱车”，商贾鲜至，贸易不兴。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，穴居野处，世代以农耕为业，糠菜自足。谦让礼义，男和女顺，风俗淳朴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勤劳勇敢的和顺人民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发扬革命传统，以百折不挠的毅力，与贫穷、落后、愚昧顽强斗争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各项事业突飞猛进，一个经济发展、文明日进的崭新和顺已屹立于三晋大地。在文化事业上，和顺县委、县政府遵循保护与开发、弘扬与发展并举的方针，立足县情，以建设文化强县为目标，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。增强文化软实力，提升县域综合实力服务，已成为全县人民的共识。

经过广大文化工作者跋山涉水、古庙荒郊的艰苦搜寻和焚膏继晷、爬罗剔抉的精心整理，这部《三晋石刻大全·晋中市和顺县卷》终于付梓出版，与广大读者见面。这是和顺文化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，是我县广大文化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，必将在保存史料、挖掘遗产、开发文化、教育后人、发展经济诸多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。

《三晋石刻大全·晋中市和顺县卷》共收录上至北齐，下迄现代，历时1400余年的石刻、碑碣309件，真实地记录了和顺的人文历史、山川风貌、风俗民情，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情况，可正史书之误，可补方志之缺。这些石刻、碑碣的作者有官吏乡绅、文人墨客，也有山野村夫，虽然他们的立足点各不相同，语言表述有文野之分，但都真实记录，当时的生活情景，再现了不同阶层代表人物的经济状况和精神风貌，不失为一部写在石头上的和顺历史。今日之和顺，是历史上和顺的继续。尽管政权更迭，沧桑变化，而文化的传承、发展却一脉相承，线索清楚，塑造了和顺人的性格，凝结成至为宝贵的太行精神。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。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视往古，更能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如何了解历史，不忘历史，弘扬历史，保护遗产，以正直、善良、勤劳、坚韧的太行精神，为开创更加富裕、文明、和谐、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。

二〇一一年十二月

概述

和顺县位于山西东陲,太行山巅,山川阻隔,地瘠民贫,自古就有“三晋疲邑之最”的说法,名不见经传。而和顺的历史悠久,秦、汉、唐、宋一脉相承。北齐置梁余县,隋开皇十年改为和顺县,至今已1419年。人文积淀深厚,保留于民间的许多古老传统,形成古意盎然的独特的太行民情风俗。欲了解和顺,必须注重查考历代的碑文石刻。《三晋石刻大全·晋中市和顺县卷》共收录自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(529)至公元2010年1400多年间的摩崖题刻、碑碣318件,其中,北魏3件,隋9件,宋1件,元4件,明23件,清142件,民国44件,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54件,年代不祥23件(唐、五代、金阙如)。佚碑15件。这些石刻碑文的内容涉及造像、诗刻、墓碑、墓志、寺观、庙宇、桥梁、道路、水利、田亩、租税、教育、灾荒、战争、宗族、风水、诉讼、村规民约、衙署文告等方方面面,作者有朝廷高官、地方大员、下层官吏、民间文士、寒儒布衣、乃至野老村夫,他们中的多数植根于民间,贴近民众,熟悉民众的生活状况,了解他们的心理诉求,真实的记录了一千多年间和顺的民情风俗、人文历史的演进,是一部名副其实的“刻在石头上的和顺历史”。

现存于和顺县西部阳光占乡沙峪村的摩崖石刻,最早一款为北魏永安二年(529),其次是隋开皇二年至开皇十四年间(582—594)的十一款,作者有官僚贵族,也有下层信众,表明当时和顺佛教之隆兴,也表明当时和顺县西部的经济文化之发达。在和顺,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话:“先有西阳寺,后有和顺城”。和顺城创建于隋开皇十年(590)后,西阳寺遗址在今阳光占乡拐子村,与沙峪石刻的内容相对照,这个说法是基本可信的。和沙峪摩崖石刻大致开凿于同时或稍后的还有云龙山石窟、麻衣寺山石窟、海眼寺石窟、天池寺石窟、仪村释迦涅槃像与摩崖造像浮雕,但俱因年代久远,保存不善,或遭自然风化,或遭人为破坏,面目全非,保存完好的沙峪摩崖石刻就弥足珍贵。

五代、宋、金之后,佛教式微,而在和顺却大行其道,记录其事的碑刻有《香山寺六面碑》;元涌泉寺《重修涌泉院记》;明《重修涌泉寺院记》《重修石佛寺记》《重修青冈寺碑记》《重修古悬空寺宋敕显明禅院碑记》;清《重修天池寺碑记》《补修海眼寺碑记》《重修青冈寺碑记》《重修圣寿寺碑记》《重修洪福寺碑记》《重修香山寺碑记》《补修重兴寺碑记》,佚碑《重修麻衣寺碑记》;民国《重修古刹荣华寺碑记》《重修古刹天池寺碑记》《重修香山寺碑记》《重修涌泉寺碑记》,清晰地记录了佛教在和顺的流传。

与佛教相比,作为本土宗教的道教,仅留有两通碑刻,即刊于明代后期的《玉皇殿重建碑记》《重修瑞云观碑》。这两通碑是研究道教在和顺流传的重要文字资料。此外,刊于元至元(后)五年(1339)的《重修懿济夫人庙碑记》,立石者为该庙住持道士白道荣,说明该庙当时亦为道教庙宇,但后之住持称作“善佑”,成为一座普通的民间神庙。

存数最多的石碑是历代创建重修神庙的碑记。神庙是民间宗教的产物,对于广大的民众而言,他们相信万物有灵,神灵是他们战胜自然灾害、疾病祸乱的精神支柱和心灵寄托。所以,有村必立庙,立庙必树碑,供奉的神圣有前代的圣人贤哲、忠臣义士,有传说中的神仙超人以及山精水怪,牛鬼蛇神,不一而足。较重要的有元代《重修懿济夫人庙碑记》《掌山庙记》《重修甫君庙记》;明代《重修显泽侯庙碑》《重修合山神庙碑记》;清代《重修懿济夫人显泽侯神祠碑记》《重修昭懿圣母祠碑记》《重修泰山行祠碑序》《重修后土圣母庙碑记》《重修姑子岩西天圣母庙序》《重修贤皇庙碑记》《重修晋祠圣母庙碑记》《重修凤凰庙记》;民国《改修青龙庙碑记》《重修掌山庙记》《重修猪佛龙王庙碑记》《重修各庙碑记》《重修峪峰山牛王庙碑记》;佚碑《重修关帝庙碑记》《修建火神庙碑记》《重修城隍庙碑记》。这些神庙创建重修碑记,或颂圣神之灵验;或记民众事神之殷勤;或写山川之秀美;或寓理于事,申修心之要切;或借事抒怀,望后之锡福无疆。言简意赅,浓缩着各个时代的文化信息,是了解和顺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。

维护一村之风水,是神庙的又一重要功能。所以,许多村庄在创立神庙的同时,建有神阁,以壮观瞻,

如清代《补修观音大士阁马王庙碑记》《创修福庆阁序》《创修灵应阁碑记》《重修观音真武阁碑记》等，无不透露出事神锡福并培村脉的信息。神庙的另一个功能即是娱乐功能，所以，古人建庙必建乐楼，不管是城镇大埠，还是山野乡村，务必娱神娱人，人神共乐。这就是在清代以后的碑文中，保留着大量建戏台乐楼碑文的原因。

和顺是山区县，封山育林，永葆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环境优美，是历朝历代人们最美好的心愿。在现存的碑文中，清嘉庆时县令刘斯裕的《禁止砍伐风水树木碑》，是第一个保护环境的官方文告。民间的则有拐上村的《禁山碑记》，青家寨村的《修池碑记》，先生堂村马氏家族的《安莹世守记》。清代佚碑《重修云龙山碑记》《新修云龙山亭阁记》，记述乾隆时县令邱延溶主持修复云龙山亭台楼阁，蒔花植树，辟为邑中游览胜地的过程。此次修复实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修复云龙公园奠定基调，造福后人，厥功甚伟。

和顺县又是旱垣，历来缺水。对水的渴求，成为人们生存的第一要义，所以，“显泽侯”神在和顺备受人们的青睐，显泽侯神祠在和顺有三处，碑文有明合山村《重修显泽侯庙碑》；清紫罗村《重修大王庙碑记》，河会村《河会创修二侯大王庙碑记》；民国河会村《重修敕封显泽侯二大王庙碑记》。居住在和顺东北乡的牛川、瓦房一带的居民，修池存积雨水，是他们与干旱斗争的重要手段。在这一带村庄中，保留下来的修旱池碑文特别多，主要是褒扬捐资修池者的盛德懿行。这些碑文有：阔地村的《水井记》，赞核桃树湾村毕姓献地捐井的义举；大夫岩村的《德施旱池碑记》，赞村人曹氏父子捐献旱池的义举；瓦房村的《瓦房四姓公施旱池碑记》，赞四姓捐献旱池的义举；青家寨村的《修池碑记》，赞村人青照德捐井献地修池的义举。清崔家坪人赵履瑞施舍旱池为三村共业，载在县志，留名后世，而上述普通村人之义举，可与赵履瑞并垂不朽了。

除修水池，另一大的民生工程就是修桥补路。古人认为修桥补路是积阴德、修来世之好事，往往一呼百诺，应者风从。这类碑文，除褒扬首倡者的盛德外，主要赞扬民众影从响应，共襄盛事之义举。碑文有：明《重修合山神庙碑记》；清《重修风云岭山神庙道路碑序》《重修廊房官道碑记》《重修永兴桥碑序》；民国《创立永定桥碑志》（前营村）《补修金石坡道路碑序》（松沟村）《重修庙堂乐楼廊房石桥碑记》（圈马坪村）《启建永固桥碑记》（军城村）。

和顺历史上虽称“代不乏人”（道光县令张兆衡语），而真正见诸史传的却寥若晨星，最著名者为明代成化、正德年间王佐、王云凤父子，科甲连第，功名赫奕。墓碑《诰赠碑》，记述王云凤祖父诰赠中大夫光禄寺卿王义的事迹，并叙王氏家族的主要成员；《处士王公之墓》，记述王云凤叔父王教事迹。《白廷璧墓碑》，文虽浅陋，却能深显小南会村白氏家族耕读传家，人丁兴旺之盛况。佚碑《创建梁馥祠碑记》，记述春秋晋国大夫梁馥子养事迹；佚碑《重修麻衣山寺碑记》，记述麻衣道人于五代战乱时，葛衣藤杖，隐居麻衣山修炼事。

和顺自北齐肇建，迄于清，一千三百余年，其守令口碑流芳者固然不少，而入“名宦”的仅十余人。佚碑《马公德政碑》，记述金大定时县令马克礼之德政；佚碑《邑侯李公德政碑》，记述清顺治时县令李顺昌之德政。

和顺虽地瘠民贫，但历代崇尚文化，重视教育。清代佚碑《和顺县学宫碑记》，记述县令李顺昌、拔贡生胡淑寅等兴学育人之事迹；佚碑《重修和顺县学宫碑记》，赞扬县令李顺昌捐资兴学事；佚碑《建和顺云龙书院碑记》，记述乾隆时县令唐楷兴建云龙书院，培育人才的事迹；佚碑《重修云龙书院捐赠膏火暨设立义学碑记》，记述道光时县令张兆衡捐资兴学，并设立义学，教育贫寒子弟的事迹。民国《重修香山寺碑记》《重修各庙记》《重修龙王庙碑记》，都透露出这一时期国民教育之普及，利用寺院、庙宇兴学育人的信息。

和顺群山环拱，四岭盘曲，居太行之绝巅，一泓漳水流经东西，山河秀美，于形胜大有可观者，历代文人题咏，为县志所载而有不尽者。诗碑《合山留题》，王云凤弘治六年（1493）省祖莹作，又有和诗五首，县志无载；诗《谒先垄有作》，刻于王教墓碑之阴，县志无载；《海眼寺摩崖石刻》，作者，顺治时县令苏弘祖，县志无载；诗碑《游合山咏》，为苏弘祖与其门生王吉士、赵漪唱和之作，苏诗与县志互有出入，王、赵二诗县志无载；诗碑《别邑中士民有序》，作者为嘉庆时县令郑玉振，与县志互有出入。

抗战时期，和顺是太行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和顺人民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，作出重大的贡献。《胜利碑记》，记述马坊军民坚持长期与敌周旋，终于攻克坊房据点的经过；《纪念和顺县党政军民抗日烈士

建碑志》，详细记述八年抗战期间，和顺党政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；《刘健等七烈士纪念碑》，记述刘波、刘守昌、侯建、杨茂林等七位身兼领导职务的党员烈士，为革命献身的事迹；《和顺县抗日烈士纪念碑》《侯马群等三烈士纪念碑》，是纪念为国捐躯的普通和顺儿女的碑记，屹立于县烈士陵园内；《平松惨案殉难者永垂不朽》《献给白云惨案的死难者》两通石碑，纪念抗日战争时期，日寇在和顺制造的两起骇人听闻的惨案之死难者，警示后人勿忘国耻。

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反映和顺各项事业建设成就的碑文有《王卞桥重建记》《赵庄峪桥重建记》《新建大窑底桥碑记》《百备桥重建碑记》《许村桥记》《榆邢公路和顺段建设碑文记》《云龙公园碑记》《合山泉水开发工程碑记》。

《三晋石刻大全·晋中市和顺县卷》编委会

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

目 录

凡例

总序.....	李玉明
序一.....	程锡景
序二.....	杨治国
概述.....	编委会

上编 现存石刻

●北魏·隋·宋·元

沙峪摩崖石刻(一)(北魏永安二年).....	(五)
沙峪摩崖石刻(二)(北魏永安至隋开皇年间).....	(六)
天池寺摩崖石刻(隋开皇十四年).....	(一二)
香山寺六面碑(宋熙宁三年).....	(一三)
掌山庙记(元至元三十年).....	(一四)
重修涌泉院记(元至顺元年).....	(一六)
重修懿济夫人庙碑记(元至元五年).....	(一八)
重修甫君庙记(元至元六年).....	(二〇)

●明

重修显泽侯庙碑(明洪武三年).....	(二三)
玉皇殿重建碑记(明成化十四年).....	(二五)
李桂铸佛建塔碑记(明弘治元年).....	(二七)
重修古悬空寺宋敕显明禅院碑记(明弘治二年).....	(二八)
重修石佛寺记(明弘治六年).....	(三〇)
合山留题(明正德二年).....	(三一)
处士王公之墓(明正德四年).....	(三三)
重修涌泉寺院记(明正德十年).....	(三四)
谒先塋有作(明正德九年).....	(三五)
重修龙劬山石佛寺碑记(明嘉靖四年).....	(三六)
和顺县仁寿里大佛头村重修香山寺碑记(明嘉靖五年).....	(三七)

重修合山神庙碑记(明嘉靖十六年)	(三九)
重修僧院记(明嘉靖三十八年)	(四一)
重修府君庙记(明隆庆三年)	(四二)
重修瑞云观碑(明万历十四年)	(四四)
重修青冈寺碑记(明万历十八年)	(四五)
山西太原府辽州和顺县温源里神掌凹重修碑记(明万历二十七年)	(四七)
志不忘(明万历四十五年)	(四八)
重修显明寺碑记(明万历四十七年)	(四九)
“为善最乐”题刻(明天启元年)	(五〇)
和顺县仁寿里大佛头村重修香山寺碑铭记(明天启四年)	(五一)
重修古刹荣华寺并金塑佛像禅院碑记(明崇祯四年)	(五二)
重修西殿碑记(明崇祯十五年)	(五四)

●清

重修青冈寺碑记(清顺治二年)	(五七)
海眼寺摩崖诗刻(清顺治四年)	(五九)
游合山咏(清顺治五年)	(六〇)
重修懿济夫人显泽侯神祠碑记(清顺治八年)	(六一)
重修碑记(一)(清顺治十八年)	(六三)
重修碑记(二)(清康熙二十二年)	(六四)
重修天池寺碑记(清康熙二十九年)	(六五)
重修府君庙记(清康熙四十五年)	(六六)
重修晋司圣母庙碑记(清雍正五年)	(六七)
新建白木堂记(清雍正六年)	(六九)
重修涌泉寺碑记(清雍正八年)	(七〇)
重修圣寿寺碑记(清雍正八年)	(七二)
重修合山庙记(清雍正九年)	(七四)
重修关圣帝君庙碑记(清雍正九年)	(七六)
泰山庙买地原由碑记(清雍正十一年)	(七七)
重修九峰庵碑记(清雍正十二年)	(七八)
河会创修二侯大王庙碑记(清乾隆二年)	(八〇)
重修碑记(清乾隆五年)	(八一)
重修香山寺碑记(清乾隆五年)	(八三)
新建西天圣母庙碑记(清乾隆九年)	(八五)
重修大王庙碑记(清乾隆十年)	(八七)
追远碑记(清乾隆十年)	(八八)

创修官房碑记(清乾隆十五年)	(八九)
重修南阁碑记(清乾隆十九年)	(九〇)
重修后土圣母庙碑记(清乾隆二十七年)	(九一)
重修凤凰庙记(清乾隆二十七年)	(九二)
□□泰山□碑记(清乾隆二十八年)	(九三)
牛王庙重修碑记(清乾隆三十年)	(九四)
重修九峰庵记(清乾隆三十四年)	(九六)
瓦房村四姓公施旱池碑记(清乾隆三十四年)	(九七)
重修姑子岩西天圣母庙序(清乾隆三十八年)	(九八)
李遂生墓碑(清乾隆四十一年)	(九九)
陈家庄官房重修碑记(清乾隆四十二年)	(一〇〇)
龙神庙重修碑记(清乾隆四十二年)	(一〇一)
重建观音阁碑记(清乾隆四十二年)	(一〇二)
重修瑞临阁碑记(清乾隆四十三年)	(一〇三)
白延壁墓碑(清乾隆五十年)	(一〇四)
重修观音大士阁碑记(清乾隆五十六年)	(一〇五)
重修洪福寺碑记(清乾隆五十六年)	(一〇六)
安莹世守记(清乾隆五十七年)	(一〇七)
重修昭懿圣母祠碑记(清乾隆五十九年)	(一〇八)
别邑中士民有序(清嘉庆三年)	(一一〇)
重修碑记(清嘉庆三年)	(一一一)
补修海眼寺碑记(清嘉庆四年)	(一一二)
创修关帝庙碑记(清嘉庆四年)	(一一三)
买松山碑(清嘉庆五年)	(一一四)
郭氏舍地碑记(清嘉庆六年)	(一一五)
补修官房戏楼山神五道庙碑记(清嘉庆七年)	(一一六)
补修观音大士阁暨马王庙碑记(清嘉庆八年)	(一一七)
重修关圣帝君庙碑记(清嘉庆九年)	(一一八)
重修姑子岩碑记(清嘉庆九年)	(一一九)
补修重兴寺碑记(清嘉庆十年)	(一二〇)
创修社房戏台碑记(清嘉庆十二年)	(一二一)
禁止砍伐风水树木碑(清嘉庆十六年)	(一二二)
重修永兴桥碑序(清嘉庆十七年)	(一二三)
重修官房乐楼碑记(清嘉庆十七年)	(一二四)
重修观音真武阁碑记(清嘉庆十八年)	(一二五)
重修五道庙碑记(清嘉庆十九年)	(一二六)